

- ★ 两位学者改革前沿思想深呼吸
- ★ 破解样板地区高速发展的神话
- ★ 打造中国第一部 MPA 精品案例

模式中国

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 **7** 个样板

余映丽 李进杰 著

温州：	中国的刀锋
苏南：	新奶酪胎动
珠江：	“汉堡包”变局
长治：	市委书记“变法”
华西：	乡村工业试验——一个永恒的命题
南街：	一个村庄里的“另类”中国
大邱庄：	能人经济的背后

新华出版社

模式中国

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7个样板

余映丽 李进杰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式中国：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7个样板/余映丽，李进杰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9

ISBN 7-5011-5866-5

I. 模… II. ①余…②李…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72 号

模式中国

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7个样板

余映丽 李进杰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20千字

2002年10月第一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11-5866-5/F·842 定价：23.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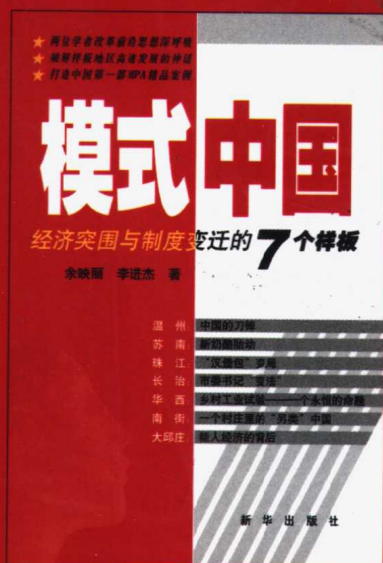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65895562 65897685)

作者简介

余映丽 青年学者，浙江温州人，全国妇女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央电视台、温州日报曾对其事迹做过报道。研究范围包括：法学、政治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现已在《中国经济时报》、《今日东方》等报刊上发表作品近100万字。著作有《国有民营与非国有化浪潮》、《最赚钱的商业模式——21世纪企业扩张旋风》、《试论婚姻法修改与时代变迁的辩证关系》等。

李进杰 青年学者，山东阳都人，研究范围包括：大众传播学、非国有经济、模式（地域）经济学、清代史、农村社会学。现已发表作品200余万字，著述有《激活中国经济》、《私营企业透视》、《中国投资银行（3卷本）》、《论新闻素质教育》、《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式的反思》、《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弱势群体、村落文化与乡土社会的变迁》等。

责任编辑 刘 飞
封面设计 肖 东



谨献给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
而辛勤耕作的实践者、思考者。

序 言

郭东涛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但名字只不过是人的符号，并不必然反映本人的内涵和本质；每个作者都想为自己的书取上一个最为满意的书名，但书名则不是书的符号，而是对书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的高度提炼和精湛概括（但并不是每本书名都能如此）。青年学者余映丽、李进杰的著作《模式中国——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7个样板》正是这样，因此，为该书作序，不妨从对书名的解析起笔。

这本书的书名由三个关键词组成：模式中国、经济突围、制度变迁。这三个关键词都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实践容量。

作为一本专门研究“模式中国”的著作，各种各样的“模式”跃然纸上，活龙活现，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长治模式、华西模式、南街模式、大邱庄模式等等，作者以实证的手法把各种模式写的有血有肉、活龙活现。实际上，作者也只是从地方和区域板块经济的角度所看到的模式。如果进一步从工业经济、行业经济或其他角度来看，还存在着其他各类模式，如：海尔模式、春兰模式、邯钢模式、中国电信改革模式、中国电力改革模式、中国石化改革模式……诺大的中国，简直是一片模式的汪洋大海。

从模式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经济学常见的现象，以至“模式”成为经济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把世界市场经济概括为以下两种模式，一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种模式既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竞争理

模式中国

论，也是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崇者和实施者，主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第二种是莱茵模式。这种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同时又兼容奥尔多理念经济模型，多一点“人道”色彩。前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推崇这两种经济模式，无非是想要把世界经济统统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东亚“四小龙”模式，打破了以上两种模式的神话，对中小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开始，就十分注重模式的研究，曾一度言必称南斯拉夫模式或匈牙利模式。但当一些人正奢谈中国要以这两种模式为师时，这两个模式之师却在“苏东巨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红旗”落地了。

2 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在国内的经济发展研究中，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然而，当人们还没有在全国其他地方真正拷贝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时，似乎这两种模式却出现了“趋同”之势。

这样看来，我似乎反对对“模式”的研究。非也，非也！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主编了一套“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14卷），探索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但笔者研究模式却不迷信模式。在该丛书的总序中，笔者以“世界市场经济模式的学习、借鉴与中国化”为论题写了这么一段文字：“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中国这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发育国家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绝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排斥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从而堵塞我们步入世界共同发展的大道。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哪种模式，对于中国来说，都不能像现成衣服一样拿来就穿，都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肠胃消化吸收，创造性的成为我们自己可行、可用的东西。现在，全中国都在建设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一样，中国国内不同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不会

绝对一致。这种不一致不仅是指现在的南部与北部、东部与西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不同。即便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普遍走向成熟或比较成熟，恐怕各个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也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实践，才可能创造出绚丽多彩的生活。”“市场经济一体化，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化，同样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里我要专门谈谈“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这句人们公认的至理名言。对这句至理名言，我最早并不是在书上读到的，而是少年时在家乡陕西南部秦岭深山的砍柴中观察到的。由于少时家境的低微贫艰，上山砍柴是我主要的家庭打工，尽管一天十来个小时的超极限劳动只值几毛钱，但别无它路。深山里的杉树、杨树、柏树、槐树、桑树、花柳树、红春树、苦楝树、板栗树、丝绵树等以及各种藤条，都是我的劳动对象，也是我的观察、思考对象。对各种树叶和藤叶，咋一看起来，片片都一模一样，但采摘下来仔细比较其大小、形状、叶筋的纹路等，绝对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这种少年时对树叶的观察和发现，使我迄今都保留着观察树叶的嗜好。1992年，我在德国吉森的大森林里；1997年，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北部的东北大森林里；近期，我在台湾阿里山的大森林里，都要采集树叶仔细观察。以至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的至理名言。

这种少时形成的定向思维，使我从事经济科学和经济问题研究中，也不认为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同的经济模式，大到国与国，小到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概莫能外。20世纪60至70年代，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出了在全国建三百个“大寨县”的政治任务和宏伟目标，但一直没见到哪个地方真正建成了“大寨县”。昔日的“大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风雨洗礼，今日已经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仍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面旗帜。“大寨”就在山西省昔阳县，精神可以学习，模式则

模式中国

难以复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国有小企业产权变革的“三城模式”：诸城模式、海城模式、兴城模式。虽然同为国有小企业产权变革的模式，但这三个城市改革的具体情况却各有千秋。如诸城，走的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而海城和兴城，则是通过产权交易，变卖长期经营困难的国有小企业。不同的做法殊途同归，都达到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效果。

大邱庄模式、华西模式和横店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小康的三个著名典型。早在1984年，我就考察调研过天津大邱庄。对江苏华西和浙江横店我都前后考察调研过两次。在浙江横店，我与金华市和东阳市的同志探讨过，能不能在全国培育横店第一、第二、第三……他们说，当地政府早考虑过，但不可能，因为横店模式就是横店这个地方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成就的，就是横店的左邻右舍也做不到。我在考察调研全国农业产业化典型湖北蓝田模式时，与同行学者探讨过，如果全国能有三百个蓝田模式，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就成气候了。大家说，再不要奢谈当年全国建三百个“大寨县”的神话了。

对“模式中国”发了这么多议论，该谈谈“经济突围”之说了。突围是战争术语，与经济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或许会有人认为有点不伦不类。我看这是作者的一个创意。经济突围可作两种含义解释：一种解释是，某经济实体被一大批竞争者所包围，要打一场无硝烟的经济战，避免被竞争者困死和消灭，突破包围圈，谋求生存、发展和壮大；另一种解释是，人民群众谋求致富的内在冲动和发展经济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被旧的经济体制所约束和压制，大家渴望改革并主动出击，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致富。显然，本书是从第二种含义上使用经济突围这一创意术语的，即所谓经济突围，不是指突破商战之围，而是突破旧的经济体制之围。这就自然涉及到对“制度”的分析。因而，对本书“经济突围”的解析，就必须与“制度变

迁”的解析结合进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统天下，全国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个人的经济活力，都被这种旧的经济体制所约束和压制，这是我国过去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低下的深层次制度原因。我国从计划经济挑战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我国持续二十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十分复杂、曲折、多层次、多镜头的，既有强制性变迁，又有诱致性变迁，还有混合性变迁。制度变迁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螺旋式的、波动的。改革的成就、新体制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是在经过进两步、退一步、再进两步的反复中实现的。

人们在分析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及沿海地区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较快成长起来的原因时，往往从当地具有搞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传统观点来论证。这一点固然十分重要，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原因，即温州、珠江及沿海地区，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经济突围的难度相对较小一些。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 1928 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作的深刻而精彩的分析。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江西、湖北等落后地区存在，是因为那些地方的旧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使得星星之火能够燃烧起来从而成长为燎原之势。固然，旧社会那种反动统治力量对革命力量的包围与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力量的包围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也是可以比较的。

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改革的脉络、轮廓及其规律性，可以说已经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从改革的进程来说，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改革的程度来说，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改革的方式来看，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三是上下结合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农民的饥饿逼出来的，因此，农村的改革就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典型的自

模式中国

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农民是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然后是曝光。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的不可阻挡之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就是经济突围的典型案列。

城市国企改革，是典型的上下结合式的改革。职工希望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工资和奖金水平，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则希望通过国企改革全面提高国企效率，从而提高综合国力，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实现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具有改革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在推进国企改革。

如果把开放也作为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那么，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为无论是经济特区、保税区和对外开放城市的设立，还是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都是先由中央政府决策，然后再从上到下贯彻实施的。我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互动的，但当改革处于“胶着”的时候，开放对改革又起着“倒逼”的作用。

我国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三种改革，其中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起着基础的、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我国二十多年改革的成功进展和深化是不可思议的。余映丽、李进杰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著作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地方农村板块经济模式的成功，以及所带动的地方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全国一盘棋、地区间同质同构、强调地方自我生存的区域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随着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下放，一盘棋的格局开始被打破，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财政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关系已不再靠中央行政权力联

结的关系，利益关系和市场经济中交换和契约原则，开始成为联结不同地区的新纽带。并且由于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发展程度不同，地方制定政策的能力提高，地区间的异质性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的程度方面明显增强。这种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构成了中国各种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宏观背景。

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导向对形成地方经济的产权、所有制结构和积累方式影响巨大，进而左右着乡村工业化微观组织的形式，最终形成不同特色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在多数情况下，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地方政府偏好及其行为的影响。在苏南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地方政府对这个目标的一贯坚持起了很大的制约和导向作用。而温州改革前的30年中，集体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巩固。温州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包产到户”实验被强行扼杀后，家庭经营并没有消失，而是绵延不绝。尽管地少人多、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由来已久，是温州模式形成的重要客观原因。但假若地方政府在公社化时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政府“一大二公”等“左”的政策，温州就不会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

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正式制度，即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成文制度，二是非正式制度，指观念、风俗、习惯、文化（可统称文化）等因素。文化对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以苏南和温州为例，苏南地区一直受主流文化的影响比较重，倾向于强制性社会控制，政策、法律、纪律是政府的主要管理手段，因此苏南人民的集体意识非常浓。他们走集体经济的路子，不仅是地方政府的选择，也符合当地群众的偏好。温州自古天高皇帝远，主流文化的影响较弱，常常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地域传统，倾向于温和型观念控制，习俗、道德、宗教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很大作用，因此温州则更多地利用传统技能和经验适应变化的新生活，人们对个人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崇尚和重视，私营经济在

模式中国

温州地区突破体制的夹缝中繁荣起来，就不足为奇了。

《模式中国》一书从制度变迁的层面分析研究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新鲜和有意义的视角。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研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因素，如集体行动者之间的权力依赖，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公私部门之间的责权划分、政府的组织框架、政府的任务和管理方式、社会自治网络及其功能等，都必须借助于“制度”这个最核心的变量。引申看来，小岗村18位农民签定生死协议进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之所以能够点燃中国经济改革的烈火，关键在于这种由社会基层突起的力量和利益要求，是中央政府提供新制度安排的不可遏止的动力。而由中央政府设计的新规则，是在地方政府及社会民众对之积极回应中实施的。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和观察地方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找到问题的脉络。

- 8 从广义上讲，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运用现行市场机制的过程，而是一个矫正制度缺陷和弥补制度稀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2001年出版的专著《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中，我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考，如果说西部地区改革滞后、体制落差是“正式制度短缺”，那么思想观念保守则是“非正式制度短缺”，两种短缺交织在一起，成了阻碍西部经济发展的铜墙铁壁。从制度角度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理性经济反应，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但当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为经济行为人的投入带来收益，同时又无法确保经济制度有效运作时，谋求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努力由此发生，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国》一书关于温州自费改革、苏南模式蜕变等描述中找到佐证。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总结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对我们进行的发展经济的种种努力，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因此，余映丽、李进杰两位年轻同志的研究梳理工作很有意义。

温州如何通过自费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苏南如何进行二次改制的艰难蜕变，珠江三角洲的神话是否破灭，“能人”与大邱庄发展的关系如何，南街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外圆内方搞发展，吕日周如何以改革者的身份演绎地方政府的改革，华西村怎样进行乡村工业化试验？这正是《模式中国》所要回答的问题。本书选取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突破制度僵局成为发展的样板和领头羊的7个典型，并以故事般的写实叙述、点缀式的理论思维，告诉读者地方经济发展模式里的一个另类的微观中国，并演绎7个典型有的如何从“异端”走向合法化，有的如何从大起走向大落，有的如何从落后的典型走向争取市场“奶酪”的榜样。作者文风活泼而犀利，在让人轻松阅读的同时获得对微观中国的真实认识。因此，本书很值得一读。

2002年9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注：邹东涛教授为著名经济学家、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导 言

草根世界里的真实思考

1

寓言树上的答案

我们发现温州是一棵巨大无比的寓言树，在现代化的里程中，它以异端的姿态耸立在所有关注改革的人们的面前，承受着思想在渐进变化的人们的唾弃、打压、质疑、接受和膜拜。

在北京的晚上，我们很难看到像乡下老家那样灿烂的星空。现代化有时就像一只套子，它将我们包装得很好看，同时，我们也要忍受它的制约。当你享受着城市夜晚的空气，忽然抬头望望被污染的看不清星星和月亮的天空时，是否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沉抑？

模式中国

2

萨缪尔森曾经说：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答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兰德斯·戴维在《国富国穷》里也在寻找这样一个答案，然而刨除理论的“试图”解说，没有一种可用的工具或者方法让我们可以点出即使是思想的金子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了，有的地方连温饱也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来自于前些年到山东牟平西关村的调研。在沂蒙山区的农民们还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的时候，西关村当年的产值是15个亿，那里的村民不仅享受着免费教育，他们花100万买了架废弃飞机摆在村里的目的，不过是给村里人见识见识。而在温州，那里的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这种差别令人吃惊。此后，我们两位作者相约不停地华夏大地上穿梭，下珠江、赴苏南、到温州、入长治、走南街，奔华西，目的只有一个，试图破解地方发展的神话，寻找那把可以打开芝麻之门的钥匙。2000年，我们深入到了温州，这是一片我们向往已经但却久未成行的旅程。尽管作者之一的余映丽一直生活在这里，但当以局外人的身份并以研究者的目光对这片土地进行剖析时，我们还是完成了一次在改革前沿阵地的思想性探险和心路历程的颠覆性蜕变。我们发现温州是一棵巨大无比的寓言树，在现代化的里程中，它以异端的姿态耸立在所有关注改革的人们的面前，承受着思想在渐进变化的人们的唾弃、打压、质疑、接受和膜拜。托住这棵树的是这样的一些精灵之根，它们以百无禁忌的热情穿透体制的僵硬外壳，演绎着一场超越了理想的经济变革之剧。尽管代价是那么大，比如温州人在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的时候，临近的台州、义乌缩在不起眼的地方躲避风暴的袭击。然而温州人富了，富的令抱着传统观念又想致富的人们找不着北。我们忽然有一种感悟：温州自费改革的精神让所有的守旧教条和理论显得那么的无力和苍白。

他们怎么富了，我们怎么穷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命题。